

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

段 晴

[摘要] 于阗语是新疆发现的古语言之一，已于公元10世纪左右消亡。于阗语文书的主要发现地是敦煌与和田，收藏地则主要在欧美各国，我国对于阗语文书的收藏起步甚晚。中国人民大学藏胡语文书，虽多有残破，但对史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是其中的于阗语世俗文书，生动地展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值得引起学界的注意。

[关键词] 于阗语；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唐代西域

中国人民大学的于阗语藏品意义重大，事关丝绸之路的研究基础。21世纪以来，有关西域文书、写本的研究，中国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非汉语写本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众多原创性成果，获得了国际学界的瞩目，为中国赢得了话语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拥有了新的材料，并基于这些新资料展开了原创性研究。^①

一、于阗语资料的世界收藏

近代中国，不仅遭受列强在军事上的入侵和政治上的压迫，还有文化上的掠夺。一百多年前，中国新疆、敦煌等地出土的文书、佛教石窟的壁画，都惨遭黑手。中国的宝贵学术资源流落海外，是近代中国的伤心史。^② 在伯希和挑选的敦煌的非汉语文书中，古代藏文占据首位，其次就是于阗语文书。当时的于阗语，是世界范围内的未知语言。伯希和带走的于阗语写本，促进了欧洲学者的不断探索。这些以婆罗谜文字书写的于阗语写本，来自丝绸之路南道的和田绿洲。在流散到国外的于阗语写本中，相对完整而精美者就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20世纪初，各国探险队在新疆发现的已经消亡的语言多达17种之多^③，有的至今尚未解读出来。这些曾经在丝路南道、北道绿洲文

作者：段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duanqing@pku.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提供的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文责自负。

① 最近莱顿大学司空竺（Jonathan Silk）教授在国际核心期刊介绍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刊发的系列出版物，其中多部是基于新材料的原创性著作。参见 Jonathan Silk,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Recent Chinese Studies on Sanskrit and Khotanese (Chiefly Buddhist) Literature”, *Indo-Iranian Journal*, 2021 (64): pp. 51–64.

② 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4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③ 原文如下：“Immerhin sind neben der Fortsetzung der planmäßigen Aufnahme und Zeichnung der Tempelanlagen bedeutende Funde an Handschriften gemacht worden, die in nicht weniger als 24 Schriften geschrieben waren und Texte in 17 Sprachen bewahrt”, “不管怎样，在继续按照计划对寺庙遗址做采集和绘制工作之外，还有重大发现，发现了写本，用以书写写本的文字达24种之多，文本保存下17种语言”。原文引自：H. Härtel & M. Yaldiz, *Die Seidenstraße, Malereien und Plastik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tempel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1987, p. 20.

明流行的语言,记录了源远流长的多元文明在新疆的历史存在。

欧洲16世纪开始的海外殖民扩张,发现了印欧语系的广泛存在。^①在中国新疆丝路南道曾经流行的于阗语,在吐鲁番等地曾经使用的粟特语等,属于中古伊朗语的东支,在更大的语言概念下都属于印欧语系。而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竟然是不曾知晓的印欧语系的另一支。欧洲的一些大学在探索研究原始印欧语系的学科领域,都将吐火罗语列入必修的语言。来自新疆的梵语写本证明,那里的佛寺僧团曾经使用混合梵语,而梵语也属于印欧语系。德国大学至今皆维系着以新疆佛教写本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印度学、佛教学等学科。新疆地区的大量石窟、庙宇的遗迹证实,佛教曾经盛行于丝路南道北道。此外,新疆还发现了基督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等证据,信仰不同宗教的各个民族社团曾经和睦相处在各个绿洲上。

中国学贯中西的上二代学者深刻了解西域文化之遗存的重要价值。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②加强对新疆、敦煌出土非汉语类文书的释读和研究,一方面可以展开对世界人类文明之源头的探索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历史置于人类文明的更大范围之中进行研究。

陈寅恪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③凡与历史相关的学科发展,必然离不开史料,而史料越原始越有价值。至今保存在世界各地、来自新疆、敦煌的收藏品,是这一系列资料的重要内容。来自和田和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资料,包括佛教写本、世俗文书,还有织入氍毹、写入壁画以及各种质地画作上的文字。这些于阗语材料,是古代历史与语言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过去的百年间,中华民族经历内忧外患,很多出土文献流散海外,严重阻碍了中国自身学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西域文书之收藏,其中的意义才能获得彰显。

德国汉堡大学伊朗学教授埃墨利克(Ronald Eric Emmerick)于1992年统计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于阗语材料及其入藏单位如下:

(1) 巴黎国立图书馆^④。主要是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取并运回巴黎的于阗语卷宗,其中多是由于阗语文献中的珍品,例如于阗语的罗摩衍那等^⑤。(2) 英国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汇集了霍恩雷(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以及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部分收藏。(3) 英国图书馆。全部来自斯坦因在新疆、敦煌的获得品。(4)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种学博物馆。来自斯文赫定(Sven Hedin),而斯文赫定的藏品全部来自和田地区。(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圣彼得堡分所。这批藏品中,数量庞大的是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在喀什就任领事(1882—1903年)时期收集到的,其中包含著名的写本《赞巴斯特之书》的大部分。另有俄罗

① 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82年曾在剑桥大学宣讲印度,他说:“But this, though it is taught now in our elementary schools, was really, but fifty years ago, like the opening of a new horizon of the world of the intellect, and the extension of a feeling of closest fraternity that made us feel at home where before we had been strangers, and changed millions of so-called barbarians into our own kith and kin.”“但是这一点,尽管现在连我们的小学都在教,却在50年前千真万确地犹如展开了一道智慧世界的新的地平线,犹如曾是陌生人的我们最亲密的兄弟情感的延伸,把几百万本来称为野蛮的人变成了我们的亲属。”参见Friedrich Max Müller. *India- What Can It Teach Us?*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3, p. 27.

② 季羨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21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③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④ 关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于阗语文献的收藏,张广达、荣新江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有全面介绍,甚至包括题记等。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118—14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⑤ 此篇已有中文翻译,参见段晴:《于阗语〈罗摩衍那〉的故事》,载张玉安等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38—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斯突厥学者马洛夫 (S. Ye. Malov) 在 1919—1920 年间在和田地区买到一些文书。还有一件来自俄罗斯奥登堡 (S. F. Oldenburg) 考察队。(6) 德国慕尼黑的五洲博物馆^①，来自弗兰克 (August Hermann Francke) 以及科尔伯 (Hans Körber) 在和田地区收集的藏品。(7)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日本龙谷大学大谷光瑞的藏品中也有少许于阗语残片。印度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有一些于阗语铭文。加尔各答原有属于《赞巴斯特之书》的 6 纸叶，现不知所踪。零星的于阗语残页又见于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部，以及不莱梅博物馆。^②

坐落在丝路南道的绿洲王国于阗古国，其文明绵延了两千多年。近代，凡是来自外国的稽古考察队，在和田必然有所收获，而与欧洲等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迟滞。21 世纪之前，甚至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博物馆也没有设立于阗语写本和文书的收藏。埃墨利克教授在综述于阗语写本的收藏时，仅仅说到中国有零星的新发现。所谓“零星”，是指《中国画报》1981 年第 1 期上刊登的一张于阗语木牍的照片。埃墨利克看到照片，随即与新疆博物馆取得联系。他从时任馆长梁春凯处得到照片，于 1984 年发表了释读文章。^③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步入正轨，人们对于保护文物的意识尚显薄弱。所以，照片寄出时，连原文物的馆藏编号也不曾明确。埃墨利克特为此木牍临时编号为 Urumuqi 1，即“乌鲁木齐 1 号”。但经过我们的调查，所谓“乌鲁木齐 1 号”没有收藏在乌鲁木齐博物馆，而是在和田博物馆，木牍正式馆藏编号是 HTB 000410。

21 世纪，盛世中国对古代西域、古代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再认识。中国的于阗语资料的收藏，经历了从零星到丰富的过程。在加强西部建设的同时，中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相继增加了于阗语文书的收藏。先后增加了西域胡语文书收藏的单位如下：

(1) 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 年，季羨林先生亲笔给国图写了信，希望国图增加梵语、于阗语等西域文书的收藏。国图的西域胡语文书，已有三百多件，尤以于阗语的藏品最为丰富，数量最多，内容涵盖佛教文献与世俗文书。^④ 于阗语的世俗文书部分，已准备出版。(2)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 2010 年建立了西域文书的收藏，其中于阗语部分达 160 多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而人大藏品中的粟特语文献，是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罕见文献，尤其珍贵。(3) 新疆博物馆也征集到一批于阗语文书，包括佛教文献与世俗文书。现存最早的一件木牍契约来自伏阗信时代 (650 年前后)。^⑤ (4) 和田博物馆，于阗语的收藏也在逐年增加，佉卢文的藏品更多一些。(5) 策勒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有于阗语木牍四件，目前已经发表三件。

除上述集中收藏点之外，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也有不多的于阗语文

① 1992 年时，这家博物馆名叫 Völkerkundemuseum “民族博物馆”。2014 年更名为 Museum Fünf Kontinente “五洲博物馆”。另参见 Bruno J. Richtsfeld. “August Hermann Franckes (1870 - 1930) Bearbeitung der Serindien-und Ladakh-Sammlung Francke/Körber im Völkerkundemuseum München aus dem Jahre 1928”. *Münchener Beiträge zur Völkerkunde, Jahrbuch des Staatlichen 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München*, 2010/11 (14): pp. 65 - 76.

② 上述内容参见 R. E. 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2.

③ 参见 R. E. Emmerick. “A New Khotanese Document from China”. *Studia Iranica*, 1984, 13 (2): pp. 193 - 198 (pl. XIV); R. E. Emmerick. “Newly-discovered Buddhist Texts from Khotan”. In Yamamoto Tatsuro. (ed.).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Tokyo-Kyoto, 1984, pp. 219 - 220.

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目前已经出版两册，分别是段晴、张志清主编的《梵文、佉卢文卷》(2013 年) 和段晴的《于阗语卷 (一)》(2015 年)，以上两种都是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

⑤ 新疆博物馆的于阗语文书的藏品，包括 4 件木牍，一些佛经残页和世俗文书。这些藏品已经全部发表。参见刘绍刚、侯世新主编：《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应指出，新疆博物馆的于阗语佛经类残页中，有《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的残页，这是首次发现。

书。此外,民间仍有部分藏品,例如一件完整的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①。

所有上述收藏,皆是和田历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有机构成。每一残片都是珍贵史料,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毕竟,中国史籍对于西域的记载十分有限。这些来自千年之前的文书,对于揭示西域的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意义非常。在提供历史证明方面,于阗语文书是汉文记载的重要补充,更有汉文不具备的特殊价值。

二、丝绸之路与佛教史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文书的前期研究已经展开。张丽香教授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已出版^②,这部书的研究资料以梵语为主,也包括了若干于阗语文书,其中发现了一片《一万颂般若》的残叶,十分重要。关于《一万颂般若》,过去仅知有一部藏译本存世,没有汉译本,未知是否有梵文本。通过语句行文分析,与已知多部《般若经》差异显著。鉴于此,学界曾怀疑《一万颂般若》并非翻译作品,或许是藏文的原创著作。现在这一叶梵文残叶证实,那部藏译本就是翻译作品。这一新材料的发现,填补了学术空白^③,今后再讲述印度佛教般若类文献,中国人民大学的这叶残片是谁也不能绕过的。另一方面,从字体判断,中国人民大学藏婆罗谜字佛经类残叶,无论是梵语还是于阗语,都体现了新疆丝路南道的婆罗谜字体特征,所用字体是于阗王国流行的抄经体。《一万颂般若》曾经在于阗流行,而目前仅存的藏译本,或许受到了于阗佛教的影响。虽然只是些破碎的写本残片,但因为来自于阗,则透露出了前所不知的历史信息。这不仅可以修改已知的历史认识,也会改变未来的历史认识模式。

在“人大文书”的于阗语佛经类残片中,张丽香教授辨识出多件原属于《僧伽吒经》文书残片。对于众多读者而言,《僧伽吒经》是十分陌生的。《僧伽吒经》有两部汉译传世,其一是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月婆首那译出,其二是公元980年来华的译经大师印度僧人施护译出的,名为《大集会正法经》。

元象元年译本十分重要,它透露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根据《历代三宝记》,《僧伽吒经》是元象元年“于司徒公孙腾第出”(CBETA, T49, 87)。又据《续高僧传》,司徒公孙腾的府邸在邺城。从东魏到北齐,政权的更迭频仍,佛教却是十分兴盛。邺城遗址位于河北临漳,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中,临漳出土了大量北齐时代的佛教造像,数量达到2800尊,另有数以千计的碎片。^④临漳附近有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佛教造像带着皇家气派,十分精美。这些佛教遗址,皆反映了从北魏、北齐时代佛教崇信的盛况。在此背景下,外来僧人月婆首那^⑤住进公孙腾在邺城的府邸,译出《僧伽吒经》。月婆首那的经历说明,至晚6世纪前叶,《僧伽吒经》的梵文本已经到达中原。

南北朝是中国的动荡岁月,但佛经的翻译与流传没有中断。有学者观察到,这一时期邺城附近的石窟建造有了明显的变化:石窟刻经和刻经造像碑增加了,佛教经典作为一种特殊题材进入石窟,而变化的原因自然与北方义学逐渐盛行有关。^⑥汉地佛教向来注重翻译,重视文字书写,融入

① 这件写本的照片参见段晴:《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西书局,2019。

② 张丽香:《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中西书局,2020。

③ Stefano Zacchetti.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In Jonathan Silk (ed.). *Brill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Brill, 2015, pp. 171-209, 详见第190页。

④ 刘晓坡、李鹏举、韩庆亚、张文娟:《河北临漳出土北齐佛教造像风格形成原因初探》,载《文教资料》,2017(25)。

⑤ 《续高僧传》:“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言高空,游化东魏。生知俊朗,体悟幽微,专学佛经,尤精义理。洞晓音韵,兼善方言,译僧伽吒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道宣著、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22页,中华书局,2014。

⑥ 参见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211、236页,文物出版社,2003。

了石窟建造艺术十分正常。理解人大文书中的于阗语《僧伽吒经》文本，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

《僧伽吒经》在于阗流行，于阗贵族争相抄写。目前发现的于阗语《僧伽吒》完整篇什或者残叶多达145件以上，至少有20多个抄本。这是于阗发现佛经抄本中最多的一部，且全部是于阗语抄本，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这件。那么，此经的于阗语文本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于阗王国使用婆罗谜文字来表述于阗语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叶，此前于阗王国使用佉卢文、犍陀罗语（印度西北方言）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公元5、6世纪，于阗王国曾流行以纯梵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文字，已经发现了梵语写本的王室御医、僧尼撰写的世俗契约，证明了这一点。从6世纪中叶始，于阗通行的是于阗语，采用婆罗谜字母拼写于阗语，形成于阗文。可知，于阗人使用自己独立文字的时间相对晚些。和田博物馆展出有几幅氍毹，其中一幅大型氍毹以及两幅方形氍毹上的婆罗谜字^①，属于最早的于阗语文字。由此可以断定，于阗人使用于阗文翻译佛经的年代不会早于6世纪中叶。

有证据表明，于阗人翻译佛经受到了汉地佛教传统的影响。例如《赞巴斯特之书》第23章是《造像功德经》，于阗语写本现存180颂，前17颂是于阗诗人自己写的，从18颂起是唐代于阗僧人提云般若的汉译本。于阗诗人在第2颂宣布说，他要翻译《造像功德经》，但他在第4颂抱怨说，于阗人不赞成用于阗语说法，认为翻译成于阗语的佛经不再是佛法。他接着赞叹汉人拥有自己的佛典。^②由此可知，汉地译经要早于于阗。关于于阗的译经与汉地译经的关系，由《僧伽吒经》引发的新课题，值得继续研讨下去。

于阗之外，吉尔吉特地区也特别尊崇《僧伽吒经》。吉尔吉特在唐代是小勃律，吐蕃强盛时曾占领这里，并企图由此进入西域。1931年，斯坦因在吉尔吉特一座佛塔中，目睹了数箱梵语佛经写本，其中就有四部《僧伽吒经》的梵文抄本。1938年克什米尔的地方政权再次进行发掘，重又发现了三部《僧伽吒经》的梵文抄本。德国印度学者封辛白教授（Oskar von Hinüber）全面研究了所有这里出土的《僧伽吒经》梵文写本，发现《僧伽吒经》梵文抄本无论语言还是字体，都带着明显的塞种人的痕迹。所谓塞种人，就是于阗人。^③封辛白认为，当时有于阗人在这里从事抄写经书的活动。从时间上看，最早的《僧伽吒经》写本完成于627/628年，而吉尔吉特与于阗王国之间维持着频繁的交往。《僧伽吒经》之所以在这些地区盛行，是因为这部经适合一种新的信仰方式，即对经书的崇拜。抄经意味积累功德，抄写经书可以延年益寿、福德无量。^④把抄好的佛经置于佛塔下，具有安置佛舍利同样的功德，同样的观念也出现在敦煌的于阗语佛经中。

一般认为，佛教东渐，经过西域到达中原。现在看来，佛教的传播路径是更复杂的，这应该才是丝绸之路的原本状态。《僧伽吒经》的汉译本首先出现在中原，于阗语译本后来才出现于阗。人大所藏《僧伽吒经》残片给出了重要启示，汉地佛教如何影响西域佛教，随着更多于阗语佛经的解读，这一课题的深入展开不可避免，且意义巨大。^⑤

三、唐代于阗

丝路南道属于绿洲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文化多元，具有鲜明的丝绸之路文化特征。以和

① 这几件氍毹，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团队的碳14测验，年代在420—565年之间。综合考察于阗语文字的历史，我倾向定在560年前后。参见段晴：《神话与仪式——以观察新疆洛浦博物馆氍毹为基础》，载《民族艺术》，2018（5）。

② 段晴：《〈造像功德经〉于阗语、汉语今译及古译刊本》，载段晴：《于阗·佛教·古卷》，131页，中西书局，2013。

③ 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的斯基泰人，正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塞种人。于阗语是斯基泰/塞人的一支方言，语言学上分类属于中伊朗语的东伊朗语支。

④ 这一节重点引用了封辛白的观点，Oskar von Hinüber. “Die Bedeutung des Handschriftenfundes bei Gilgit”. In Harry Falk & Walter Slaje (ed.). *Kleine Schriften* Teil II.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pp. 668—687.

⑤ 以往研究表明，中原佛教影响西域的情形在吐鲁番地区是存在的，参见陈世良：《从车师佛教到高昌佛教》，载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40—153页，1990。现在看来，和田地区也大有可能。

田出土的古代文字而言,多种文字显现的内容更是多方面的,环境、经济、宗教与社会,无所不有。以于阗语的文书为例,把各藏品交叉对比研究,部分地复原历史某些真相已经不再遥不可及,有时甚至能够以一个家庭为核心,建立起比较充实的个案资料。于阗语文书藏品丰富,是西域和丝绸之路历史的特别馈赠,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历史的多层次描述。

鉴于于阗语世俗文书的多样性,埃墨利克曾做过如下分类:

(1) 官方命令。(2) 收据。(3) 报告与信件。(4) 旅行路线。(5) 字母表。(6) 词汇。(7) 书写练习类。(8) 宗教类。^①

人大文书中 160 余件于阗语世俗文书藏品中,多见官方命令、收据、报告与信件。这些文书的时代主要集中在 8 世纪晚期,事件发生的地点以杰谢为中心。其中大部分文书涉及税收的内容,包括人头税、各种织物、牛、羊皮、芝麻、麻油、马料,等等。针对这类文书的释读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学界对于阗税收情况的了解。此外,还有买卖土地契约、办案记录等,从中也可以窥见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之一斑。文书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大多数已经为于阗研究领域的专家所熟知,比如尉迟信、思略等,但也有一些新地方、新面孔,可为学术研究添砖加瓦。以下仅以若干个案展示其学术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藏品 GXW0398 号于阗语文书(参见附录图 1),定名为“瑟尼洛之牒”^②。仅从此命名已可以看出,该文书写于唐代,文书格式受到唐制公文格式的影响。文书涉及于阗王国屋悉贵一地的民事案件,而亲临审案的是于阗王。案件的内容大致如下:有一人告状说,他的妻子走失。于阗王召高僧前来,请他们协助开庭办理案件。于阗王接着抱怨说,怎么案件一下子多起来?之前也有来自唐朝的汉官当值几年,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案件?

这件文书文字不多,但很完整。据此可知:于阗王国有类似现代的民事法庭。而主审是于阗王,另需要僧人参与办理。唐朝的官员与于阗国的官员对于当地的管理曾有过交接。于阗王国民事纠纷法庭的构成,以及当地百姓与唐朝官员的关系,几个层次的内容就这样被呈现出来。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这件文书也提供了解释具体词义的极佳例句。

GXW0404 号文书(参见附录图 2)上写了两项征税记录。第一项征收絺紬的记录上涉及 18 人,并提到了两个新的村名:阿娑没壤村(Asamarāṃṇa)与没道藏村(Budāysāṇa)。第二项则是媲摩守捉下令征收 2 硕麻子,命令下达到杰谢乡,每丁交麻子 4 升。这里出现了于阗语“麻子”的两种形式。通过这件文书,可以推测征税的大致流程:媲摩守捉将命令下到杰谢萨波处,杰谢萨波再根据各村的纳税人头数进行分派。杰谢乡纳税人数有 50 人,每村的纳税人数大约在 10 人左右。这也佐证了学者们之前的判断。

对于历史研究,于阗语写本的每一片碎纸都是珍贵的。唐朝治理西域,并非一帆风顺,武则天时期恢复了对安西四镇的控制,朝廷发兵三万驻守四镇,从而加强了对西域和丝路的治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 30 多件开元十年、十五年的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牒,是对拔伽等地老百姓的征粮记录。征粮的木牒上出现双语记录,说明那些粮食是供给驻于阗的唐朝镇守军的。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部分西北军事力量前往中原勤王,于阗国王尉迟胜把自己的王国交给弟弟尉迟曜管理,自己亲自率领军队赶赴中原。^③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削弱,吐蕃趁势大举进攻,763 年,吐蕃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④,安西四镇实际上已经成为唐朝的飞地。依据《新

① R. E. Emmerick.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Khotanese Manuscripts". In J. Harmatta (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Akadémiai Kiadó, 1979, pp. 167-177.

② 范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一件于阗语文书》,载《语言学研究》,2020(28)。

③ 刘煦:《旧唐书》卷一四四《尉迟胜传》,3924 页,中华书局,1975。此事《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记载。

④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188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简短记述，曾有郭子仪的侄子郭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①吐蕃占领陇右之后，郭昕率将士闭境拒守，与唐朝廷不通声闻达十年之久。^②安史之乱后，唐廷自顾不暇，自然无法供应西域，那么西域将士如何坚守，如何解决军需，这在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和田出土的于阗语、汉文文书，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几乎唯一的资料。为了闭境拒守，他们需要发展出特别的税收制度，这就是给当地社会委派差科。但是，于阗社会的风俗、制度毕竟与中原王朝存在差异，再加上语言问题，唐朝的驻军与于阗社会如何沟通，其中细节仅凭汉文史料是很难捕捉到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于阗语文书（BH1-17，即吕玘胡书），大约书写于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前后。书写者名叫吕玘，他是汉人但精通于阗语。他负责在杰谢一地征收差科。而差科是唐朝的税收制度之一种，主要指“官府临时设的徭役”^③。在于阗地区，似乎更多以钱、物来冲抵，即以租代役。吕玘非常了解安西镇守军郭昕所遵循的唐朝差科制度，当他看到杰谢当地的乡绅已纳足的物品、钱时，他对差科做了详细的解释。特别指出，他了解郭开府（郭昕）的要求，杰谢要派出“力役”，这是差科的内容。吕玘口中的郭开府（郭昕），是安西镇守军的最高首领。镇守军的相关制度也与当地社会紧密连结。于阗王统帅于阗军队支援唐朝，广大的于阗人民继续为镇守军的贡献了人力、物力，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形，具体而生动。

杰谢一地征收上来的钱、物，存放在吕玘处。人大文书GXW0402是件于阗语文书，是与上述国图文书有关的文书，涉及当地的乡民后来到吕玘那里用人力作为抵押，借到了钱。而彼得堡的一件于阗语文书，则显示了杰谢的乡绅对吕玘表示不信任。公元782—785年间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多层次的问题，要综合释读几地的收藏品，才能得以展现。如此丰富的文书史料，为于阗千年文明提供了珍贵记忆，为唐朝有效治理和田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目前，国家图书馆和人大所藏于阗语写本、文书的释读、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随着更多文书解读出来，唐代于阗的社会样貌将会揭开面纱。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在东方语文学，尤其是新疆新发现的语文的研究上，我们中国学者实在应该比欧美学者尽更大的努力。因为第一这些材料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第二这些语文对中国文化史的关系太深了。”^④

On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Khotanese Manuscripts with Specific Focus on the Renmin University Collection

DUAN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dead language nowadays, Khotanese sank into oblivion around the 10th century. Dunhuang and Khotan are the two famous locations where Khotanese manuscripts used to be found. Many Khotanese manuscripts have been collect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llectors. Although most non-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Renmin University collection are fragmentary, they are interesting materials for historical study. The Khotanese manuscripts in this collection are especially

①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郭昕传附）》，4613页，中华书局，1975。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7303页，中华书局，1956。

③ 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铎牒〉跋》，载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1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④ 季羡林：《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载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7-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valuable, for they vividly show how the Tang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ly governed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past.

Key words: Khotanese; The Silk Road; Renmin University Museum; Western Re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责任编辑 张 静)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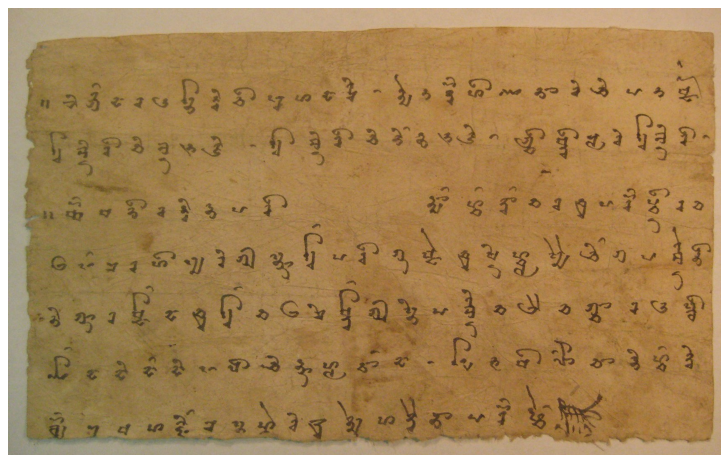


图 1 GXW0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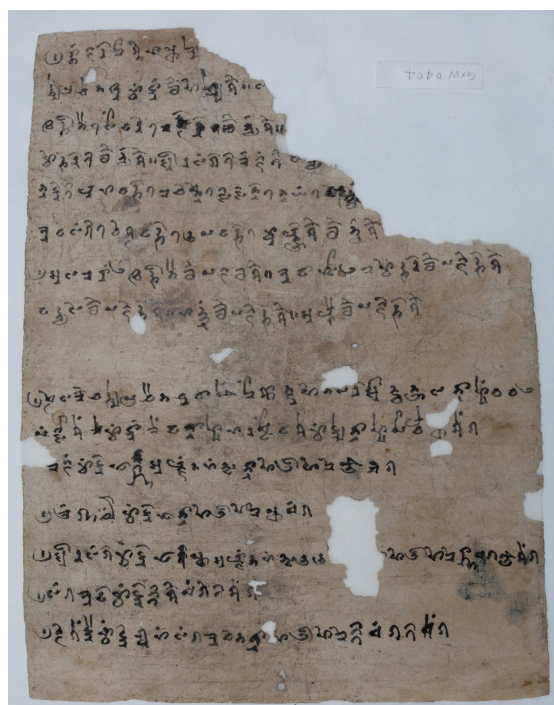


图 2 GXW0404